

## 霍桑小说中的宗教叙事伦理

阳根华<sup>1</sup>, 陈琳<sup>2</sup>

(1. 湘南学院 中文系, 湖南 郴州 423000; 2. 湘南学院 大学英语部, 湖南 郴州 423000)

**摘要:** 宗教叙事伦理以宗教传说与宗教教义作为潜在的叙事资源与创作题旨, 是宗教伦理形态在叙事文本中的具体描摹。霍桑借助原型叙事力图为解决现代社会问题寻找宗教伦理价值的回归, 表现了作家应有的道德责任。

**关键词:** 霍桑; 宗教叙事伦理; 原型叙事; 他者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124(2012)01-0027-05

宗教叙事伦理以宗教传说与宗教教义作为潜在的叙事资源与创作题旨, 围绕人的各种关系纠结传达个体特殊的生命体验与道德法则的各种例外情形, 是宗教伦理形态在叙事文本中的具体化。宗教以否定现世的哲学本质来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援系统, 将人的整个社会伦理生活秩序指向某种终极意义或终极信念。<sup>[1]</sup> 文学在宗教叙事过程中产生伦理效果, 是基于信仰所形成的道德悖论而呈现的一种辩证思维理则的展开。19 世纪的美国文学被称为“宗教批判与宗教道德时代的文学”,<sup>[2]</sup> 生活在这一时期的浪漫主义作家霍桑无疑是其中最具影响的作家之一。

### 一、原型意义下的文本创作

受清教思想与欧洲文学传统的影响, 霍桑从《圣经》、萨勒姆巫术以及新英格兰历史中寻找叙事之源, 以离奇的宗教内容反映人类复杂的道德现象, 形成了释经般的叙事特点。《圣经》具有庞大的意象系统与复杂的意义体系, 且作为后世阐发宗教理念的原型被诠释与再诠释。这种意象思维方式无疑为霍桑的创作带来帮助, 也为读者提供了原型解读的途径。

(一) 数字原型观照下的叙事结构与人物类型化

《圣经》里的数字大都被赋予了特殊的含

义。“三”是其中出现频次仅少于“七”的数字, 它暗含人们完整的结构原则, 同时也包含完全与完美的属灵之意。譬如神是圣父、圣子与圣灵的三位一体。人是灵、魄、体三部分组成, 围绕人神关系轴心建立起人与神、人与人、人与世界的三种关系。基督教义主张信、望、爱三德以求完善人性。《创世纪》以三个过程说明人世的起源: 犯下原罪; 逐出乐园; 期待复活。从数字原型的创作意义来看, “三”即意味着完整叙事、完全人性以及完美的艺术印象, 霍桑的作品按照犯罪—悔罪—罪赎的三个环节展开叙事, 体现了西方文化中传统的整体观念。霍桑认为因原罪而出现灵肉分离的人性才是真实的人性, 完美即意味着堕落, 因此完全人性应是罪与赎的统一。因受清教徒关于“预定论”思想的影响, 霍桑尤为强调作品中以死赎罪的结局形式, 增强了作品中源于命定的恐怖色彩。伊桑·布兰德四处寻找“不可恕之罪”, 结果发现罪在己心而绝望自杀。丁梅斯代尔犯下通奸罪而深陷 8 年的罪感折磨之中, 最后竟精殚力竭而亡。《七角楼》则稍有不同, 在发咒—应咒—解咒的线索中贯穿果报的情节。原罪的故事中包含三种人物原型: 罪人、诱惑者与万能的存在。霍桑小说中的人物至少也可分成三类, 即背负精神重荷、行为矛盾的教徒; 异化

收稿日期: 2010-03-22

基金项目: 2011 年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1YBB334)。

第一作者简介: 阳根华 (1972-), 男, 湖南安仁人, 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欧美文学。E-mail: ygh.cn@163.com

的他者(妖妇或天使);敏锐深邃的艺术家(画家、雕塑家等)。相对前两类人物,后者明显身份不够固定且含义模糊。《会预言的肖像》<sup>①</sup>写一位无所不知、能洞察人们心灵的神秘画师,投身大自然却与芸芸众生隔绝。欧文是《美之艺术家》里一个追求自然唯美的钟表匠。《玉石人像》里的雕塑家肯甬是温暖而理智的观察者的化身,画家米莲则是体验的智者。

### (二) 地狱与魔鬼原型的化用

地狱与魔鬼早于《圣经》而存在于各种信仰中。《新约》把地狱描绘成充满痛苦与黑暗的“永刑之处”,表现出阴森可怖的情景氛围。霍桑常常以夜晚作为故事发生的时间,以老屋、林野、陵宫、街巷、舞会以及画室等场所为地点,追求阴郁压抑的视角印象。《裹寿衣的老小姐》里反复出现的时间与地点都在夜晚和古屋,由黑(夜的颜色)白(尸布的颜色)两色组成的画面中一个黑奴的鬼魂拿着火把(“地狱之火”)。《玉石人像》写四位主人公前往圣·加里斯都的地下陵寝作“一种梦境中的游历”,小说以宽阔的坟墓、阴影重叠的甬道、白色的骨灰与闪烁的火光组成人物活动的环境。不难看出,霍桑笔下由黑、白、红三色组成的画面来自基督教关于地狱的说法,冷暖两种色调的强烈对比暗示了人物内心的撕裂,突出一种属魔的梦幻感觉。作为传统的恶形象,魔鬼在不同历史时期与创作中的形象诠释并不一样。原始巫术中的邪魔是“非物质的、不可见的和附身物质形体的或有替罪物的”。<sup>[3]</sup> 17世纪在欧洲著名的审巫案中,据女巫们的描述魔鬼是身着黑衣、体形高大且专事诱惑的男性。<sup>[4][24]</sup> 魔鬼化名为撒旦进入《圣经》后,则被刻画成一种比人还要低劣的生物,具有淫欲、傲慢和诱惑等特性。<sup>[5]</sup> 在保留魔鬼原型意义不变的基础上,霍桑拥有足够的空间去对这一形象加以再创造。

- 糅合圣经、巫术以及清教徒外形特征塑造魔鬼的复合体。《小伙子古德曼·布朗》里的魔鬼是衣着朴素体面、手握蛇杖的老人(后又说成是一道黑影,就像《玉石人像》里伴随米莲前后的阴影)。
- 从巫术角度去刻画魔鬼。《红字》中的老巫婆西宾斯太太担任“魔鬼的代理人”,<sup>[41]</sup> 她说的恶魔是出没林野的黑男人。
- 意义上的

魔鬼。《胎记》与《拉帕西尼的女儿》里的现代科学家作为神的创造力的对立面,试图用“魔力”改变造物主所设定的宇宙规则。<sup>[6]</sup> 霍桑以地狱般的场景与可怕的魔鬼形象生动地概括了当时社会的败德恶行,象征了人类阴暗、邪恶的内在世界。

### (三) 原型的意义生成

霍桑作品中所记述的人物事件大都能找到同《圣经》以及巫术原型的某种相似,并在保持原型原初意义的基础上赋予其一定的现实意义(象征意义)。当代研究者认为象征作为一种思维方式,通过隐喻、寓言、拟人化、符号、写意、对比等方式进行思考和表意,具有理性思维和非理性思维混合的倾向。<sup>[7]</sup> 人们通过《创世纪》中的人物与故事原型来解读《红字》中的三位主人公丁梅斯代尔、海斯特与奇灵沃斯,诠释人类始于原罪的宗教创作理念。从语义诠释的角度看,牧师 Arthur Dimmesdale 的名字中 Arthur 使人联想起 Adam(人类始祖亚当),两个首字母 AD 则正好是 Adultery(通奸)的前两个字母。<sup>[8]</sup> 蛇与鸽子是来自《圣经》里的动物原型,前者代表了诱惑者的形象;后者作为《圣经》里的祭牲之一,是悲伤、和平与爱的象征。在《玉石人像》的塔楼上一群鸽子与温柔、纯真、虔诚的美国姑娘希尔达(朋友称她为鸽子)朝夕相处,象征了主人公的仁爱与善良。在美国文学中,莽林、古宅、荒墓等这些北美殖民时期最为常见的景物也是特定的意义载体。霍桑笔下的森林既象征自由和希望,也代表危险与邪恶(魔鬼出没的场所),作者尤为强调其作为描述人类孤独绝望状况的深刻寓意。“七角楼”古宅象征了人类罪恶的渊薮,传达了罪恶因袭与轮回报应的伦理观念。平琼家族自先祖掠夺他人土地建起豪华的七角楼开始,罪孽便一代代相传。镜子与老妇成为某种意象则得益于作者对萨勒姆历史尤其是巫术时代的了解,女巫代表了作品中对立于上帝的异端邪恶。小说人物丁梅斯代尔、伊桑·布兰德与胡珀牧师等则无一例外地成为了人类宿命的缩影,寓示人生于罪而归于罪的宗教内涵。

原型叙事与作者追求作品中神秘、恐怖的哥特式风格彼此契合,使作品中的宗教叙事具有了

丰富的象征意义与强烈的情感氛围。与传统的哥特式写法不同，霍桑将萨勒姆巫术、神秘主义、超验论思想与新英格兰风物等因素融入创作中，强调一种压抑、冰冷的恐怖感。相对于血腥暴力所带来的强烈的感官冲击，霍桑似乎更愿意以深宅、冷尸、暗影与恶梦所形成的画面去表现冷侵入骨的心灵颤动。就像读者在《裹寿衣的老小姐》中所看到的，月影婆娑的宅第里，流苏垂帘的阴影印在苍白冰冷的尸体上。《七角楼》里的平琼法官像他的祖先一样突然死了，阴郁的古宅、银白色的月光、惨白的脸组成了小说中最为阴冷的一幕。

## 二、宗教叙事框架中的他者角色嬗变

男女关系是一切伦理关系的开始。研究者认为，现存人类生存形式均隐藏于上帝创造的秩序之中。<sup>[9]</sup> 他者作为男权话语体系下对女性的一种角色认定，可追溯到上帝造人的神话传说。伊甸园里因魔鬼的诱惑，人类始祖偷尝禁果萌生性念而失去永生。故事表明男女关系中女性的从属地位，与诱使男人堕落的罪妇原型。基于对欧洲文学传统与美国社会现实的了解，霍桑小说中至少塑造了三种类型的女性角色：妖妇、天使与理想中的女性，表现了清教伦理背景下复杂的婚恋观、家庭观和女性化意识。与僭越宗教戒条，挑战世俗伦理的传统意义上的妖妇（像犯下不贞罪的海斯特）不同。霍桑笔下的妖妇同时兼有女巫与恶魔的特点，特指作品中缺乏人世温暖且不为人所理解的老年妇女群体（老寡妇和老处女）。外形上她们穿着撑着裙箍的破旧长裙，老且脏；习性上像鬼魂附体般行为诡异，且深居独处与世隔绝。伊迪丝是《裹寿衣的老小姐》中的一位主人公，15年前的恋情使她遭受不幸，永远一袭白裙机械地尾随在出殡队伍后面，成为当地一个预示不祥的符号。《老埃斯特·达德利》写一个留守总督府第，试图唤醒镜中先灵以恢复昔日生活旧景的保守女人达德利。镜子是古巫术的通灵道具，霍桑也认为“镜子从来就是通往灵魂世界的窗口或门户”，<sup>[10]</sup> 它使人物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七角楼》里的赫普兹芭小姐深居古楼，一生与贫穷相伴，孤独、封闭、干瘪成为这个贵族老女人最鲜明的特征。西宾斯太太是《红字》中

一个“脾气古怪刻毒”的老巫婆，怂恿海斯特到森林中去拜会魔鬼，后作为女巫被处决。在西方文化中，老妇曾被视为神秘、古怪、顽固、隔绝与邪恶的女巫形象。有研究表明，“女巫常见的形象是一个被病态的意志和怨恨所支配的人，她们没有正确的邻里关系和团体意识。”<sup>[4]20</sup> 当社会等级制度带来更大的矛盾冲突时，弱势群体中的此类女性尤其受到蔑视与镇压。据记载，在近代欧洲被指控为女巫的有一半是那些更老更穷且没有儿女、不受人们欢迎的寡妇。<sup>[4]263-268</sup> 17世纪的萨勒姆镇也曾一度巫术盛行，1692年爆发审判女巫的丑闻，当时霍桑家族的先祖就牵涉其中。对人物形象的巫化处理反映了女巫案对作者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以及作者对此类人物复杂的心理。

其实与巫化妇人相比，天使是另一种异化了的女性，所不同的是人物身上尚能体现作者创作观念中某些温暖的人道主义因素。从欧洲回来之后的海斯特由传统的妖妇转化为天使，成为镇上人们特别是妇女心中的圣徒——她们常常来到她的茅屋，寻求解除人间一切痛苦、不幸和罪恶的良方。海斯特用自己坚定的信仰使她们确信，承蒙圣恩的人们终将在双方幸福的基础上建立起男女之间的全部关系。<sup>[11]</sup> 希尔达是《玉石人像》中降临人间的天使（尚不懂罪与爱情），因为朋友的罪孽而饱受灵魂的煎熬。不过天使毕竟不是他者本身，是塑造者根据自己的认知、想象构建出来的，表现出男性基于固定的等级模式对他者顽固的审美诉求。所以在成为天使的过程中，从海斯特身上可以发见维多利亚时代关于女性的一套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忍耐、忘我、奉献与牺牲等所谓的美德。让海斯特变成天使的“中性化”（天使的属性：无性、永生）艺术处理减弱了主人公追求婚姻自由的现实意义，以及单亲家庭中女主人公命运的悲剧感，<sup>[12]</sup> 显示了“罪孽教育提高”人们的精神功能。

《七角楼》里的少女的菲比是19世纪美国社会生活中理想女性的代表。她来自新英格兰的农村，受母亲影响具有女商人与好主妇的双重品质，是纯洁、善良、贤能的典型。霍桑一生中有两个对他产生重要影响的女人：一个是蒙受家庭

不幸、内心封闭的母亲；一个是婚后给霍桑与家庭以极大帮助的妻子。对女性的不解与温暖感受促发了作者内心对母性的认同和期待。作为男权社会的反叛者，海斯特没有忠于婚姻与丈夫，但作者却从不回避女人深藏内心的慈爱母性。她独自承担抚养、教育女儿的责任，身处逆境也从未动摇。为了捍卫自己做母亲的权利，她甚至跑到总督府与当时的统治者据理力争。小说中作为母性表现最为真实的一幕，那就是做女红（针线活）。《红字》单独用一章来介绍“海斯特做针线”。在《玉石人像》中米莲闲暇之余也做起了针线活。书中写道区别于男性活计的女红具有温馨、柔情、感人的特征，“有高深思维和造诣的妇女乐于缝纫，是健康优雅特性的象征。只有当她们做针线活时，心境才最为平和。”<sup>[13]</sup><sup>[2]</sup>针线不仅使海斯特获得了经济和思想的独立，使她成为一位手工艺术家，<sup>[14]</sup>还能抚平女人心中的激情。霍桑意识到了物质环境对女性心灵的干预作用，却不能从现代性别意识中去辨识女性的内倾向，母性崇拜只说明了作者对女性的原始情感依赖。所以，在他看来，理想的女性不仅有忠贞的妇德、做贤妻良母的品质，还必须有贵族般优雅的气质（潜在的阶级意识）。如果说胸佩红字的海斯特是红玫瑰，那么希尔达、菲比等则属于紫罗兰式宁静柔雅的女性。所以从外形与性格上看，霍桑作品中的女人也可以三种颜色去加以描绘：黑色的女巫，红色的妖妇，紫色的少女。黑色象征阴郁暗淡，红色象征激烈毁灭，紫色象征高贵忧伤。在霍桑笔下，女人们常常是为显见某种观念而出现的符号，而不是为表现充满生命活力的自我而存在。

霍桑小说中的他者代表了当时社会中的弱势孤寡、家庭主妇与职业女性。面对19世纪后期由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各种婚姻与家庭问题，如家庭结构松散，婚姻观念发生改变，婚外情、离婚率不断上升等，霍桑强调源自基督教义的婚姻伦理准则：贞洁，忠诚，这无疑使小说人物陷入人情与欲的两难境地（就像海斯特）。

### 三、清教伦理的双重性

霍桑对待清教的态度是矛盾的，这既体现在他的婚姻观念上，也表现在对清教徒行为的审视

上。他一方面肯定清教徒创建殖民地的积极入世精神以及清教徒围绕罪与赎的核心主题所引申出的虔敬、谦卑、严肃、诚实、勤勉和节俭等品德；另一方面揭示清教伦理在清教徒殖民者及其后裔身上的荒谬暴虐：扼杀人性，排除异己，建立起“选民”制。清教徒为强调殖民地的完整与纯洁，围绕清教教义强化敬神、禁欲、顺从等伦理观念——可这显然不符合人们追求自由的初衷。海斯特与牧师违背了“十诫”中的禁淫乱而犯下通奸罪，可事实上波士顿的居民谁不心藏“红字”？胡珀牧师以黑纱遮面非但不能掩盖内心的邪恶，反而加深罪感。《小伙子古德曼·布朗》是借鉴古巫术中的半夜“拜鬼仪式”而写成的关于人魔派对的梦境故事，与会者是来自萨勒姆的各色人等，故事揭示了属魔的人性。魔鬼告诉布朗早在殖民时期，布朗家族就曾残暴地迫害异教徒与印第安土著，那时魔鬼就同布朗的祖先们在一起。

在清教教义关于原罪与“内在堕落”的观念影响下，霍桑坚持以揭示恶、强调人的罪感体验为创作的基本主题，并强调宗教伦理的指导作用。人因与上帝（理性）隔绝而蒙蔽堕落，并长期与孤独相伴，霍桑将这种孤独表现为伪装、排斥、叛离、窥视与内心挣扎的折磨，暗含人必死于孤独的哲理。威克菲尔德（见《威克菲尔德》）经历了不安—出走—窥探—回归，内心纠结于自感被忽略的莫名惶恐和渴望抚慰的精神犹疑。过于关注自我而导致的精神疏离导致了对人间关爱的漠视，这本身就是一种罪过，而其中的根源正在于人性的自私与傲慢。丁梅斯达尔的内心痛苦主要来自于虚荣与责任的两难选择，他不敢走下圣坛面对“红字”，面对自己心爱的人和波士顿教众。《七角楼》的家族罪孽源于对他人生命的漠视和对财富的无耻占有，作品无形之中影射了清教徒罪恶的殖民掠夺。《通天铁路》则尽显现代朝圣者的傲慢无知。正如《利己主义，或，胸中的蛇》里一名艺术家所指出的，膨胀的自我主义同潜入人心的恶魔一样可怕（人类始祖的罪因：恶魔诱惑；自我膨胀），人们再也不可能变得纯洁。因此，霍桑在《玉石人像》中认为人必须经由罪孽的痛苦洗礼，凭着对上帝的敬畏，才

可打破隔阂建立起互爱互助的关系基础,以期实现基督教普世伦理价值的回归。因为罪孽已将人们拴到了一起,并成为人类在教育理智和灵魂上最有效的工具。<sup>[13]390-391</sup>所以,没有罪感意识的人是残酷无情的,清教徒们的矛盾行为暴露了其信念的脆弱与道德的虚伪,显示了清教伦理内在精神与外在表现的割裂,及其宗教性与世俗性的双重属性。

霍桑出身于马萨诸塞州萨勒姆镇一个没落的清教世家,身上的清教主义影响根深蒂固。研究者认为,在面对 19 世纪美国工业社会所带来的巨大变化以及各种要求社会改革的呼声对人们所形成的冲击,在传统与现代的观念冲突中以及当时布满阴霾的政治环境里,霍桑选择了以宗教叙事与宗教主题去反映当时复杂的社会道德问题,可谓是应对时局的一种政治文化策略。不仅如此,霍桑在创作中既遵循了一种宗教的叙事逻辑,同时也体现了作家起码的道德责任。他强调小说中的罪感体验与内在的自我救赎,避免了血腥浅陋的道德快感;注重场景画面的表现功能与意象的象征意义,产生了高位的审美体验与震撼心灵的伦理效果;从历史或现实生活中获取题材,体现了“纪实传真”的最高叙事伦理原则。<sup>[15]</sup>霍桑的影响就在于他作品显示了宗教信仰所具有的普遍意义与伦理价值。

#### 注释:

① 文中所选霍桑短篇小说均引自《霍桑短篇小说选》,黄建人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6 年版。

#### 参考文献

- [1] 田薇. 试析宗教伦理的涵义和问题[J]. 山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5): 149-154.
- [2] 李安斌. 清教主义对美国文学的影响[J]. 求索, 2006 (6): 199-201.
- [3] 弗雷泽. 金枝[M]. 徐育新, 汪培基, 张泽石, 译.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6: 518.
- [4] 罗宾·布里吉斯. 与巫为邻: 欧洲巫术的社会和文化语境[M]. 雷鹏, 高永宏,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5] 林中译. 圣经中的魔鬼及其社会伦理意义[J]. 世界历史, 2004 (4): 89-100.
- [6] 陈玉涓. 试析霍桑作品中的魔鬼形象[J]. 宁波大学学报: 人文科学版, 2000 (2): 53-55.
- [7] 居阔时, 瞿明安. 中国象征文化[M].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24.
- [8] 田俊武. 霍桑《红字》中的人名寓意研究[J]. 外国文学研究, 1999 (1): 99-103.
- [9] 李宁. 论基督教婚姻的伦理价值[J]. 学术研究, 2008 (7): 45-49.
- [10] 霍桑. 七角楼[M]. 贾文浩, 贾文渊,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1: 221.
- [11] 霍桑. 红字[M]. 胡允恒,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1: 206.
- [12] 阳根华. 主体萎缩与他者缺失——霍桑小说中的婚姻制度与家庭结构[J].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9 (3): 131-133.
- [13] 霍桑. 玉石人像[M]. 胡允恒, 译.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0.
- [14] 陈榕. 霍桑《红字》中针线意象的文化读解[J]. 外国文学评论, 2007 (2): 89-97.
- [15] 王成军. 叙事伦理: 叙事学的道德思考[J]. 江西社会科学, 2007 (6): 29-35.

## Religious Narrative Ethics in Hawthorne's Novels

YANG Gen-hua<sup>1</sup>, CHEN Lin<sup>2</sup>

(1. Chinese Department, Xiangnan University, Chenzhou 423000, China; 2. English Department,

Xiangnan University, Chenzhou 423000, China)

**Abstract:** Religious narrative ethics is the specific description of religious ethics morphology in the narrative text based on religious legends and religious doctrines as potential narrative resources and creative theme. With the help of archetypal narrative, Hawthorne tries to find the regression of religious ethical values for the solution of the problems of modern society, which shows the writer's moral responsibility.

**Keywords:** Hawthorne; religious narrative ethics; archetypal narrative; the other

(责任编辑 张文鸯)